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 著

周师铭 沈丙杰 沈伯根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增长理论**

[英] 阿瑟·刘易斯 著

周师铭 沈丙杰 沈伯根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755-1/F·349

---

1983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206千

印数 4 000册 印张 17<sup>1</sup>/<sub>8</sub> 插页 4

定价: 24.10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BAB22/08

## 出版说明

《经济增长理论》是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阿瑟·刘易斯(1915— )1937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1958年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963年后,移居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担任过许多国际委员会的经济开发顾问,帮助建立并于1970—1973年领导加勒比开发银行。其主要著作有:《经济计划原理》(1949年)、《经济增长理论》(1955年)、《发展计划》(1966年)等。因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建立贸易条件的新模型而与美国经济学家 T. W. 舒尔茨共获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书较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涉及的范围广泛,可说是一本有关经济增长的巨著。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只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基础,以满足当今政策制定者的实际需要。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因素,如人口、资源、经济制度等等。首先,研究产出的增长必须考虑与产出的分配关系,但本书主要分析产出增长,而不是分配。其次,研究产出增长必须考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本书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第三,产出是指商品和劳务,与其所提供的福利、满足和幸福等无关,本书仅仅探讨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

务的各种方法。最后,作者还分别探讨了产出、人均产出、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不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有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人的行为时才论及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就是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否则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产出增长加快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有关。第三是增长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因素既有区分又往往交错在一起,在某些社会或历史时期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或历史时期起着较小的作用。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信息、制度的转变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演变问题,如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或者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类的态度和制度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性的循环?作者以既重视具体事例又注重概括的方法,探讨了这些值得探讨而又难于明确回答的问题。

经济增长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使我国的经济较快地增长,这自然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本书以大量篇幅着重探讨了富裕国家在发展中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可望在较贫穷的国家中重现,以及影响较贫穷国家发展的种种因素及其互相关系,并提供了大量资料,对正在建立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我国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参加本书少量章节翻译的还有胡国城、赵中、徐耀林。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5

本书根据英国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1955 年版译出

#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言	4
第一节 定义	4
第二节 方法论	6
第三节 布局	16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20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	21
(一) 禁欲主义	21
(二) 财富和社会地位	24
(三) 有限的眼界	28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	32
(一) 对工作的态度	33
(二) 冒险精神	45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57
第三章 经济制度	63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63
(一) 非物质报酬	64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67
(三) 劳动报酬	72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79

(一) 优点·····	79
(二) 市场的规模·····	82
(三) 组织·····	85
第三节 经济自由·····	90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90
(二) 纵向流动·····	97
(三) 市场的自由·····	104
第四节 一些事例·····	118
(一) 宗教·····	118
(二) 奴隶制·····	125
(三) 家庭·····	133
(四) 农业组织·····	143
(五) 家庭手工业·····	163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169
(一) 变化的过程·····	169
(二) 变化的周期·····	189
第四章 知识·····	197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198
(一) 科学前的社会·····	199
(二) 发明和研究·····	203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214
(一) 对革新的态度·····	214
(二) 知识和利润·····	217
第三节 训练计划·····	221
(一) 先后次序·····	221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	227

---

(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 .....	231
(四) 企业管理 .....	238
第五章 资本 .....	244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	244
第二节 储蓄 .....	260
(一) 储蓄的必要性 .....	260
(二) 国内来源 .....	275
(三) 外来资金 .....	299
第三节 投资 .....	324
(一) 制度基础 .....	324
(二) 起点 .....	336
(三) 稳定性 .....	347
(四) 长期性停滞 .....	359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	373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	373
(一) 人口的增长 .....	373
(二) 规模和产出 .....	392
(三) 职业 .....	406
第二节 国际关系 .....	419
(一) 国际贸易 .....	419
(二) 移居国外 .....	440
(三) 帝国主义 .....	451
第七章 政府 .....	463
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	464
(一) 政府的职能 .....	464
(二) 生产计划 .....	471

---

第二节 公营部门 .....	483
(一) 政府开支计划 .....	483
(二) 财政问题 .....	487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	502
(一) 通往停滞之路 .....	502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	511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	516
(一) 经济增长的好处 .....	516
(二) 贪得无厌的社会 .....	522
(三) 过渡问题 .....	528

## 序 言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

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画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期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

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 1956 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J. M. 洛先生、J. 马尔斯博士、K. 马丁博士、R. H. 普雷斯頓牧师、P. 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 M. N. 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他们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 年 7 月于曼彻斯特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定义

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书中所述并非全是对专门名词下确切的定义；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增长,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而消费却在下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即在对比一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成本;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作为产生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

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不至于说我们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测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要前后一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作者认为拥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上。为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关产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毋庸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短。或者人口中劳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上说的集团,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国家集团所下的这

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 第二节 方法论

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到人的行为时才论及自然资源。这就是说,自然资源的贫乏显然使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各个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资源的贫富来解释。但是,也很明显,有些国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资源,可是它们的发展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

对人的行为应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增长既有近因,也有这些近因的起因。近因主要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这只是一

些主要的表现。若是不作出节约的努力,无论是由于缺乏节约的愿望,或是由于习俗和制度挫伤节约的努力,那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近几个世纪以来产出增长加快显然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有关。第三,增长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近因虽说在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是却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的分析是从这些近因的背后加以探讨,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小。我们要问,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细分如下: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从不同社会对商品和劳务具有不同的评价中得到解答,这种评价又同对非物质上的满足,尤如对闲暇、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谊和宗教的助人为乐等的评价有关。必须确定精神与物质价值冲突的程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其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正当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再进一步探讨藏在后面的原因将与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关。什么原因造成一个民族的一套信念对增长或多或少比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念?形成不同的信念和制度是由于种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或者仅仅是由于偶然的歷史事件?

这些问题都是互相适合与否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或信念

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长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类的态度和制度在以往几个世纪里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性的循环?

我们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习惯说来,其领域应由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来加以划分,可是,此类划分即使曾经进行过也从未奏效。因此人们或许期望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近因,但他们研究的选题极为有限。他们研究了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了流动性、发明创造和冒风险的重要性。他们还小心翼翼别出心裁地分析了节约愿望的逻辑含义。有的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制度;19世纪的经济学家特别经常引证土地所有权、长子继承权以及合资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20世纪的40、50和60年代,这类研究不再时兴了。有人甚至权威地宣称这类题材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项目。这个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信仰论者、律师、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可是,他们只是发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们认为社会学家已把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又将这个课题留给社会学家。正由于普遍的态度是把研究领域留给别人,也许本作者进行通盘考察的大胆尝试将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样,也许这个领域看来不再令人泄气,假若本书能最低限度地对这个领域的资源和潜力提供一个粗

略的概貌的话。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是从数理逻辑上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上述研讨的成果对进行短

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研讨某一集团在一段短时期内的历史,在这段时期内,基本的制度和态度均被认为变化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进行趋向变化的长期研讨,或是想进行集团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研究,那我们通常就不得不超越当今经济理论的界限进行考察。

在将演绎法应用于研讨制度和增长是否适合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偏见的危险性。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有关联的事物也一定必然与所有其他社会的事物有关联。利己主义与增长的关联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较少承认社会义务。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倘若个人所获得的成果将只归于他自己本人,他就会作出节约的努力。但倘若这些成果将与他的远亲家族或全体家族来分享,或是与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来分享,或是在利己主义社会里与不会自动地被承认的提出要求的其他成员来分享,那么人们是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社会考查努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有无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们除了进行观察,无法防备这类偏见。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力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这些概括可以作为不同社会的对比,并且还能进而用来对制度作出评价。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有些制度和信仰可能适合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互相一致。例如,经济增长同国家把 20% 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形成是适合的,或者同私人企业把 20% 的国民收入投

资于私人资本形成是适合的。但在同一个社会里国家投资 20% 于资本形成,而私人企业也投资 20% 于资本形成,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制度之间的互相适合性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研讨适合性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保持自己的信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有人曾经尝试说明一个社团与另一个社团具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回答,但这仅仅重申难题所在,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某一宗教、具有某一教义,又为什么在某一地区接受这种宗教,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接受。还可以从自然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同来回答,如果这些都解释不了,那么也可以用历史上偶然事件来回答。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懂得这些问题在目前知识的状况下肯定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也不要期望本书能作出回答,不过本书将扼要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以相当的篇幅阐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适合性问题,以及态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进而探讨态度的本身、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们会起变化时,我们迟早会遇到了解人类历史的局限性。

社会演变问题甚至比适合性问题更难于回答,因为演绎法对解答这类问题的帮助要小得多。我们必须考查事实,以便了解某些事物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这就是说,对历史的数据,我们必须应用归纳法。

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并颇有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



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的国家,在近几年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发生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不过,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例外,因为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出看法是应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

时,他所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很难从这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果列出方程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可靠,后者的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

的动物,不设法进行了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物如何发生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分量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  $a$  到  $z$  可变数的行为;并且我们假设  $a$  到  $g$  保持不变,而  $h$  到  $r$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够预测结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事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出一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能对“假若……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

经济增长理论；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设的基础。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新的可变数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分的原因，我们才能期望对社会变化的状况和缘由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在本书写到社会变化的缘由时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写到社会可能往什么方向变化时则信心不足或者说毫无信心。关于变化的过程存在少数已充分确立的概括——比如说谁最可能是革新者、模拟的作用、抵制变革的根源以及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概括看来在下述意义上可以普遍应用，即今天社会变迁的过程与二千年前的大致相同、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也大致相同。因此，在写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可以把人类全部历史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不必去寻求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这种情况与我们研讨适合性问题大致一样；人们对待财产、报酬、或生儿育女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可是不同的社会具有足够的共同观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演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普遍规则。因此，倘若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能够说出变化将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无法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方法论的这一导言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书没有采用其他经济发展分析中可以看到探讨途径。我们不相信有可能

说明某个社会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不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陈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每一个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从原始阶段进到封建社会,再进入交换经济,因此,我们不步孔德、马克思、赫伯特·斯潘塞或韦伯的后尘。我们的全部预测的基础要脚踏实地得多,即探讨富裕国家在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也许可望在较贫穷国家里重现,如果后者发展的话。有时我们能颇有把握地回答;例如,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或者说地位观念的关系将不断让位给契约关系。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比如说,预测生活水平提高后,出生率是否会下降,或者预测战争是否为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内容是指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一些后进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步先进国家的后尘。至于对先进国家本身,我们认为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受我们认识的或能够认识到的不变规律的支配的。

### 第三节 布局

关于经济增长著作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选择的问题。鉴于所研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从任何问题入手都无关大局。本书一开头就研讨节约的努力以及决定努力势头程度大小的信仰和制度。其次,本书进而研究知识对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播的方法。关于人均资源的探讨则从资本这一章开始,然后在人口这一章中继续探讨。这样就很自然地引

向研究国际贸易,因为它是人口资源分布比例不同的结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实际上它从属于每个章节,但是考虑到政府的重要意义,把政府问题单独放在最后一章来研讨是适宜的。每一章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从适合增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关系、制度和信仰;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事物为何产生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是否能够看出任何趋向。

在经济增长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对我们的主题进行这样的划分使得有必要经常强调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倘若能从国外得到更多的资本,它多半与新技术有联系,而且很可能影响制度和人们态度的格局。如果发现了新知识,必将刺激投资,同时制度也将会受到冲击。若是制度自由化了,人的努力将会增加,同时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也将会更多。社会变化是累积的,不同的因素会起到相互加强的作用。

尽管有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仍有人断言,某一个因素比一切别的因素更为重要。例如,亚当·斯密和一大批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主要在于有正确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怎么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意愿,知识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反应,只不过受到了错误制度的抑制而已。在另一方面,马尔萨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乃是缺少需求,今天可以理解为“低估与业余闲暇有关的收入”,这个观点至今仍有不少附和者。另外一个学派则坚持认为技术不熟练是妨碍增长的瓶颈环节;例如,杜鲁门总统对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宣

称,不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那里所需要的主要是技术援助。还有另一学派则认为,资本是个瓶颈环节,他们宣称只要有了资本,就可以得到新技术,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敌视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度都将改变或废弃。最后,还有一个学派则把重点全都放在自然资源上,他们实际上主张每个国家应根据其自然资源来筹集资本和建立制度。由于这些不同的重点,“不发达”一词就具有不同的含义。一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的原因可能有:与其他国家比较它的技术落后;或是它的制度相对来说不利于投资;或者说与西欧相比,它的人均资源较低;或者是由于人均产出较低;或是它虽拥有可贵的自然资源(矿产物、水力和土地),但尚未开始利用。一个国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不发达,但在别的意义上则不能算不发达,但事实上这些指标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因而当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提出“不发达”一词时应用某一含义而不应用别的一些含义时,就会感到奇怪。

当然,确实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某一阻碍增长的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这就是说这个缺陷在这一点上是最突出的,或者说从这点出发比其他点开始要容易。例如,可以设想,有些国家当前主要阻碍其增长的是制度(比如说,腐败的政府或恶劣的佃租法),这就是说倘若制度改变,更多的知识和资本就会涌现,别无他法。同样,也可以设想,在别的地方现行的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障碍,主要短缺的是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若农民以肥料和良种的形式引进新技术,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时候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问题上而排除其他大多数的问题。不过,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因为倘若一个人成功地克服了一个瓶

颈难题,结果常常却又有其他难题会突出起来。如果农民开始用良种和肥料,就需要新的资本来经营额外产出;如果有了资本,抵押和别的投资法必须制订得恰如其分;如果制度改进了,某些别的阻碍增长的因素就会呈现出来。因此,虽则改良者开始时只研讨一个因素,他必须记住若要取得完全的成功,除了他当前关心的因素外,还会牵涉到许多别的变化。

在本书中,我们把各种增长的起因加以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由于这些起因是相互关联的,为了避免误解就必须把本书作为整体来研究;每一句话、每一段落或每一章节应不成问题地看成与别处所写的相联系。若是将上下文割裂开,那就会成为谬误。还有某些题目,如宗教在好几章里都提到了,但每次都是从经济增长的某些不同方面加以论证的。当人们不得不仔细剖析无法进行解剖的题目时,造成一定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试图把混乱压缩到最低限度,用的方法是在文章里经常运用前后参照的方法,但是若读者希望得到某一题目的全部观点,则必须为此目的使用索引。



##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正如我们所已经论述过的,促使经济增长的三个近因为经济活动、增进知识和增加资本。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先探讨经济活动。

所谓经济活动,我们意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经济活动对经济增长说来是必要的,就是说除非人们尽力去挣得更多的成果,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增长是人类努力的结果。大自然对人类并不特别仁慈;若是对大自然任其自流,那么到处将出现杂草、洪水、瘟疫和其他灾难,人类通过思考和采取行动才能防止这些灾难。只有接受环境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人类才能通过无数的途径用比较少的努力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产品。

接受大自然提出的挑战就要乐于进行试验、发掘机会、不放过机会和考虑整个策略。在产生最大增长的社会里,人们的眼光注视着经济机会,并且愿意随时抓住机会。

目前各个社会互相之间差别极大,这表现在其成员发掘和开拓利用经济机会的程度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团体之间(比如说,地区、宗教和种族团体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行为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追溯到三个明显的原因,即对物质产品和为取得这些产品所需